

传统中国人系列

中华五千年的

真觉醒

◆ 自强不息，是觉醒
◆ 中庸和谐，是觉醒
◆ 革故鼎新，是觉醒



编著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五千年的真觉醒 / 龙山雨编著.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7. 8
ISBN 7-80123-105-8

I. 中… II. 龙… III. 历史-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9219号

中华五千年的真觉醒 龙山雨 编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交道口北三条32号)

邮编:100007 电话 64027526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20千字 插页:2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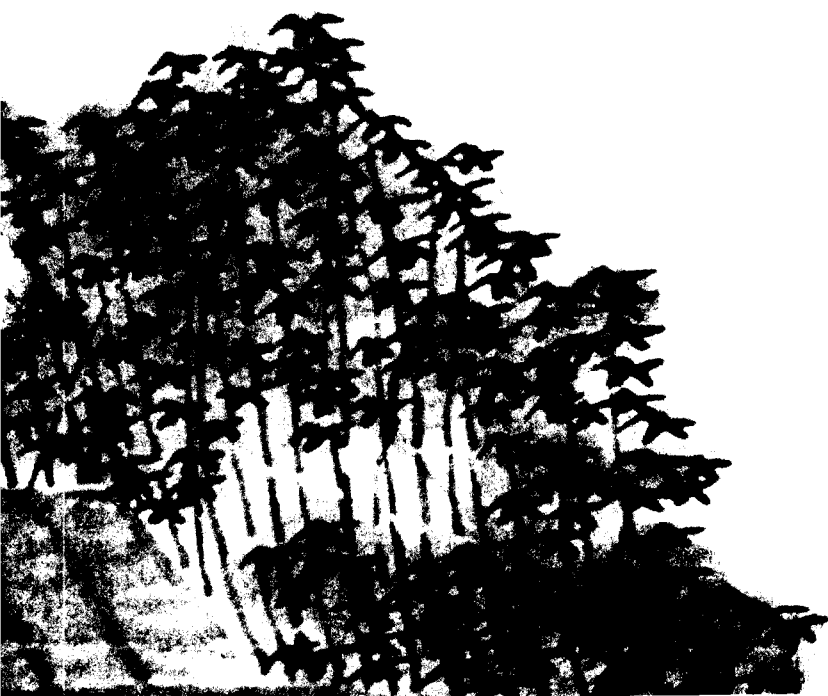
印数:000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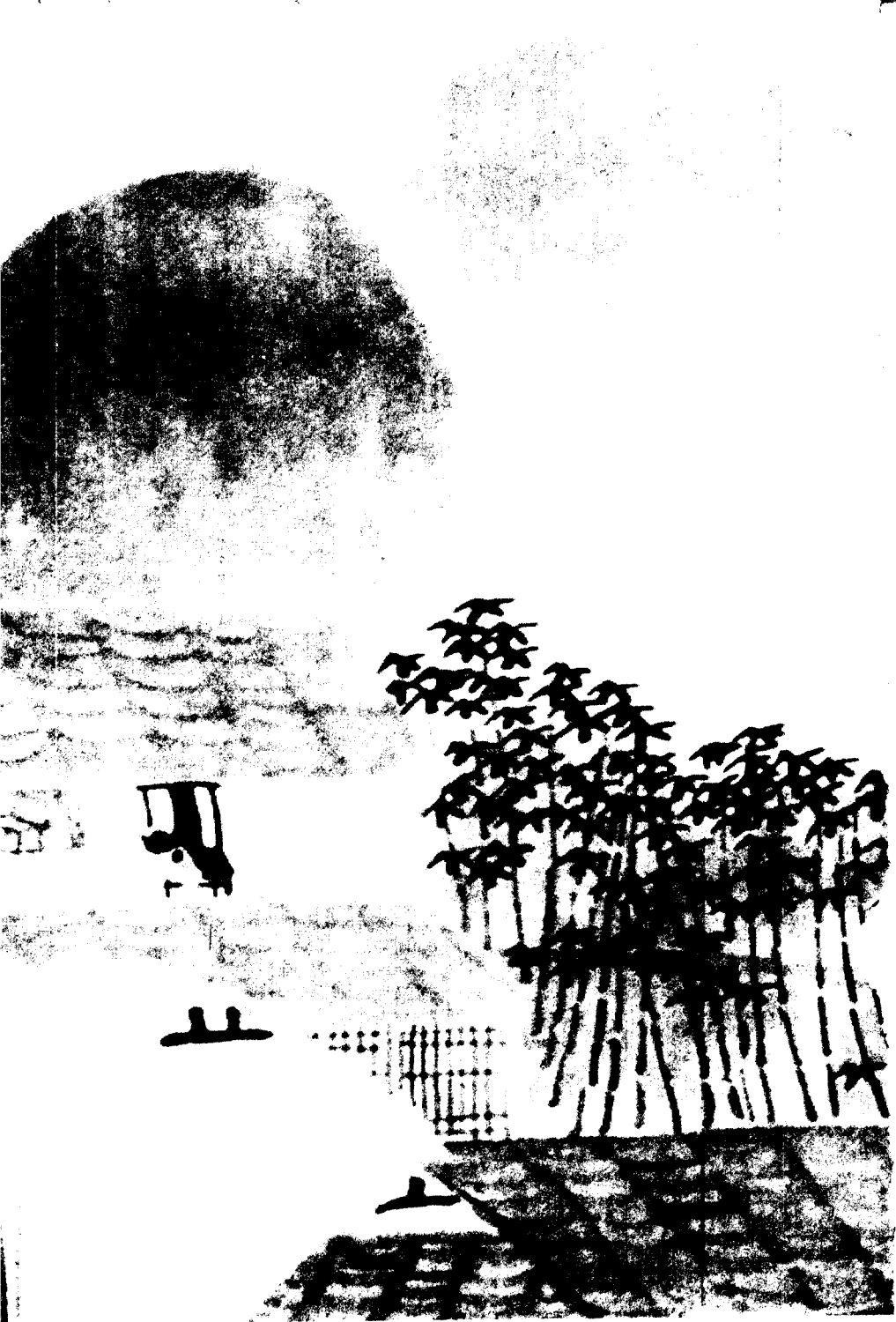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殷涵 插图:任洪青

ISBN 7-80123-105-8/G·38

定价:21.80元

难得
觉醒





序

当我们翻开中外史籍，剧烈的战争和政治、经济间的冲突无不使我们触目惊心。兼并战争是表象的、剧烈的斗争形式。当支撑秩序的各方面力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主导力量的优势丧失时，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的公开争斗也就出现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战国时代的七雄争霸历史尤为剧烈，所表现的特点最为显著，纵深解剖这一段竞争历史，七雄的存活之道，取胜的战略，给中国人留下的不仅仅是累累伤痕，更多的是民族的觉醒。

一、夏、商、周微澜不惊

传说时代的中国，其社会组织为部落的利益联合体，即部落联盟。各个部落联盟之间虽有争斗，但基本上和平共处，逐渐同化形成后来的中华民族。

自夏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家天下”的局面。夏王朝的统治者称为“王”，“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指一个贯通于天地人间的人，这反映出王是天地人的主宰、最高权力的象征。

由于有了这种绝对权威，夏、商、周三代之王能够会合诸侯到指定地点集会，运用王的权威来申明自己的意图，迫令和诱使诸侯按王的意志办事。相传“禹朝诸侯之君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仅仅是开会迟到了，禹即将防风君处死，足见其权力之大。

由于王权具有绝对的权威，各诸侯势力不得不俯首听命。据传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殷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西周初年，“尚有千八百国”，至西周后期还有“千二百国”。这些诸侯国对天子之国有拱卫、纳贡的义务，是天子的屏藩。

对于天子来说，这些诸侯国越多，个体实力就越弱，就更利于统治。虽然它们之间的兼并战争不断，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争斗并称不上激烈，对天子的地位也构不成威胁。

所以，直到西周为止，周天子仍以绝对的权威，维持着天下的有序。因而孔子概括为“礼乐征伐自天下出”。

二、春秋：权威丧失的兼并战

当主导力量丧失以后，原来众多弱小的势力集团必然打破沉默，各自抢占地盘，扩充势力，以求获取一席之地。而兼并战争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从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元年）周王室东迁洛邑到公元前 476 年（周敬王 44 年），这一阶段的历史大体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年代（公元前 722 年—公元前 481 年）相当，所以史学界称之为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原来最尊贵的名号“王”，在此时虽然还作为周天子的专称，但其政令已逐渐不能越出王室的所辖地。春秋列国在名义上虽然还奉周天子为宗主，但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并且建立和完善了自己所辖地区的各项政治制度，出现列国并峙的局面。然而，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意识，各国的君主仍按照周天子的分封秩序，分别称为公、侯、伯、子、男。有关本国的重大事务，形式上还要向周天子请示。

春秋中期，出现强国争霸的局面，周天子不再拥有名义上和

实质的约束力。先后形成的霸主，取代周天子为列国盟主。这种联盟是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形成的。列国有自主权，但又必须服从盟主的征调。列国的国君的封号也可随意变更，如晋国在取得霸主后，就改称为公国。

列国相互争霸，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土地为主要目的战争更加频繁。大国吞并小国，势力渐渐合流。此间史书记载的邦国有一百多个，但著名的只有齐、鲁、晋、秦、楚、宋、郑、卫、陈、蔡等十余个。

由于邦国林立，各大诸侯国的兼并战争有了缓冲空间。同时，这一时期的战争形式主要以战车为主，战争规模并不很大，持续时间也不很长，因而竞争态势并不十分剧烈。

随着周天子权威的逐步丧失，一些强大的诸侯国，想取周天子的地位而代之。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公开夺取天子之位，会遭到其他诸侯国的嫉妒与反对，不如表面打着“尊王”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天下莫敢不听”。因此，各大诸侯国在争霸角逐时，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周天子依然是诸侯攫利的“遮羞布”。

由于王室的衰微，春秋时期“礼乐征伐出自诸侯”了，这是权力重心的第一次转移。

如果将周王室比喻为总公司，那么诸侯国则是分公司，公卿则为子公司。当总公司的权力被分公司瓜分之后，子公司的地位也相应地得到提高。

因此，当周王室衰微，诸侯兴起之时，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王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不断扩大土地和实力。有的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弑君，废立君王。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

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这样，权力的重心再次发生了转移，礼乐征伐出自大夫了。到了春秋时代晚期，就出现了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事件。其中，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时代的开始。

晋国到了晋定公时，大部分的贵族已被消灭了。势力膨胀的六卿赵、魏、韩、智氏、范氏、中行氏六家，分别占据一块地盘，实行武装割据，基本上把晋公室分割肢解了。

为了扩充实力，以“卫贡”事件为导火索，中行氏、范氏与赵鞅发生了武装冲突。智氏、魏氏、韩氏出于保持实力的均衡的目的，加入了这场斗争，将范氏和中行氏赶出了晋国。

六卿只剩下四卿，权力就更加集中了。晋定公为了削弱四卿的力量，准备联合齐鲁攻打四卿。智、赵、韩、魏四家得知这一消息，共同联合起来，赶跑了晋定公。智伯立晋哀公，控制了朝政，又占领了范氏、中行氏的故地，成为四家实力最强者。

智伯在取得较大优势的情况下，萌生了取代晋公之心。于是，他假名出师伐越，向韩、赵、魏三家展开了勒索。韩、魏实力较弱，就满足了智伯的要求，而赵襄子毅然地加以拒绝。终于，两股较强的势力又一次发生了冲突。

智伯为了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裹挟韩、魏一同攻赵。赵襄子根据谋臣张孟谈的建议，以晋阳城作为防御地。由于城池坚固，民心归附，智伯围城久攻不下，赵襄子乘机派张孟谈以唇齿之利害游说韩、魏，韩、魏考虑到自身利益，就同赵联合，一举灭掉了智氏而三分其地。

随后，三家又把晋君所剩土地分去大半，晋君反而要去朝见三家，公元前403年，三家通过周天子册命，成为诸侯。

从这一年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共一百八十余年，就是

战国七雄铁血大兼并时代。

三、战国：智慧与实力之争

经过春秋时期力量的重新组合，最后形成了魏、赵、韩、齐、楚、秦、燕七支大力量。历史上将这七股力量称之为“战国七雄”。

周天子对三晋的认可，表明天下“共主”的权力表里俱失。“尊王”这块遮羞布已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同时，七大势力之间的缓冲空间消失了，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是硬碰硬的短兵相接。再加上生产技术改进，铁制兵器的发明和运用，更使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令人触目惊心。

此间，以战车为主的作战方式淘汰了，代之以步兵和骑兵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大大提高了战斗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因而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如齐魏的马陵之战，秦赵的伊阙之战和长平之战，所造成的双方人员的伤亡数目是非常庞大的，据有关资料统计，仅秦国的战争狂人白起屠杀的敌卒就达近百万人，且手段十分残忍。

由于兼并战争如此残酷、剧烈，以专门研究战争攻防的军事学得到迅速发展，主要有孙臆兵法、吴起兵法、商兵法、庞涓兵法、信陵君兵法、尉繚子兵法等。其中孙臆兵法和尉繚子兵法所提出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都非常的至善至美。

面临如此严峻的竞争，可供七个列强选择的存活之道只有一条，即变革图存、富国强兵。魏国魏文侯率先行动，任用吴起，李悝进行了政治、军事变革，使魏国在战国初期称雄一时；而后，吴起革新楚政，齐威王整顿吏治，赵国胡服骑射，秦孝公用商鞅，韩昭侯用申不害，燕昭王的千里马战略，都从整体或者局

部进行了政治、军事改革。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革最为成功，最为彻底。通过商鞅的改革，使这个曾经一度被中原诸侯齿冷的戎狄之国，最终鹤立于群雄之列。

在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进程中，各国君主、列卿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特别是宗法血缘关系普遍遭到破坏，广纳贤才为己所用成为当务之急。因而分布广泛而有能量的士阶层成为君主、列卿争取的对象。

战国时期的“士”的构成非常复杂，他们低于大夫，而高于庶人，属于低级没落的贵族。按制度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因而他们当中许多人才华横溢，极富文韬武略。于是，各国列强以官、爵、禄招徕士人，卿大夫以养士来扩大势力和提高声誉，多者有食客数千人。战国四公子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秦相吕不韦纳士为最。这些士人中自然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在激烈的竞争中，也确实有一些有才能的士人脱颖而出。在战国时期，政绩卓著而又功名盖世的，诸如吴起、乐羊，商鞅、庞涓、孙臆、苏秦、张仪、乐毅、白起、范雎、蔡泽、廉颇、蔺相如、李牧、土翦、李斯等人，均先后成为君主的重要辅臣，或为名臣，或为名将，或为名噪一时的策士，成为当时军事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

由于这些士人的出现，使得竞争的各大势力集团，除了依仗自身的实力以外，还运用智慧和谋略来达到超出实际水平的效果，因而构成了谋略加实力的竞争的新特点。这一时期，谋略学被广泛用于竞争的各个领域。孙臆的避实击虚，以少胜多的策略；毛遂、蔺相如折冲樽俎，以一人之威加于万乘之君的恐吓策略；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策略，灭亡六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策略，塑造了秦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以外在的形象包装赢得了中原六国诸侯的敬仰。

利益是竞争的原动力，然而，一味追求短期的利益又是竞争者败北的主要原因。秦帝国统治者洞悉此中奥秘。恩威并施的远交近攻策略就是缘此而订的，最先入彀中的是齐国和楚国。在秦国的屑微利诱下，两国背弃了自己的盟友，转而和秦国相亲。这样，在与自己势力均衡的齐、楚进行了暂时妥协后，秦国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吞并三晋和燕国四股弱小势力。随着三晋与燕国的灭亡，秦国的实力又膨胀了数倍。曾经一度可以与秦相抗衡的齐楚，转而变成弱势。因此，秦国没有遭受多少阻力，以大吃小，完成了对六国的兼并。

四、觉醒：传统的精神与意识

“白骨留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是战国时代血淋淋的征伐战争的直接后果，更是民族的深重灾难与浩劫。然而正是由于诸多灾难的刺激，才使得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与意识有了觉醒的动力。

这种精神与意识的觉醒，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觉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觉醒。其中最具特色最为重要的有自强不息精神、时代忧患意识、传统价值取向、革故鼎新精神、君子人格、中庸和谐等等。

（一）自强不息精神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心态，它还体现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开拓精神上。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历史，民族的前进步伐之所以一直没有停顿，就在于始终自强不息。

古代中国，变革改制的改革家不时出现，它使整个民族不断发展变化。到了近代之后，中国落后于西方，其自强不息精神更

是充盈于整个近现代史，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族自强不息的典型事例。而今天，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壮举，更要注意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主体精神。

（二）时代忧患意识

时代忧患意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的根本特点是对“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自觉认识。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而不衰，与忧患意识是分不开的。东林党人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事事关心”，正是忧患意识的形象表述。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宝贵的财富，也是当今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手段。

忧患意识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感和责任感，是要求努力改变现状的奋发精神，是敢于接受世界挑战的大无畏的主体精神境界，这对于正在走向发展的中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和极为宝贵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民族若没有忧患意识，便没有紧迫感和奋起感，便没有积极能动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的产生。因而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主体意识”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是激发中华民族这主体性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之一。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当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这样才有全新的中国未来的发展。

（三）传统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在对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其实，义利之辩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争论的课题。究其实质，争论的焦点是在谋取利益时，应以何者作为优先的指导原则，是道德优先还是利欲优先，是以德为本还是以利为本。

战国时代是一个人性大暴露的时代，义利之辩作为突出问题，摆在当时诸多的哲学家、思想家面前，答案自然是多种多样，有孔子的重义轻利，孟子的崇义非利，韩非的崇利简义，墨家的义利兼重，老庄的义利双弃论等等。

应该指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须把义利结合起来。义不离利，利不离义，利以义为目标，义以利为基础，这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东方文化本色。

（四）革故鼎新精神

革故鼎新精神，即是除旧布新、不断改革社会和社会革命精神。它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升华；离开革故鼎新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所以革故鼎新精神与自强不息精神相比，显得更为重要。

昔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在自己洗澡的器皿“盘”上刻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若有一天能够自新，则应天天自新，新了还要更新，这便是一种革故鼎新精神。

革故鼎新精神作为中国人传统精神风貌，在战国时代表现尤为突出。改革开放是现代社会的生存原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国策，我们要坚持改革的原则和精神，才能知变、应变、适变，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君子人格

东方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渗透在中国人对人格理解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理想的人格典范，它涉及到人的主体力量的知性潜能、德性力量的开发与审美情趣诸方面问题，是真、善、美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

这种理想的人格以仁、智、勇为主要特征，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强调人格的独立。所谓“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坚持原则，勇于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积极的影响。

君子人格当今并非过时东西，对于我们如何做一个现代人，如何树立现代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传统背景或传统框架。

(六) 中庸和谐

尚中庸，喜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态和思维方式，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曾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极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和谐统一不仅是一种心态与观念，同时又是一种能力与组织，使天下不同的事物各得其所，相互协调而发展。此外，它又使大统一观念成为民族的理想观念，转化为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动力。更重要的是，和谐统一的观念不仅在社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然领域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其作用更为巨大。

可以说，和谐统一观念是未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共有的重要财富，它对于整个人类的贡献将是无可估量的。

五、宜将商场作战场

早在六十年代，国外经济学者就借用一些军事术语，如策略、战略、战术、决策等概念来阐述营销理论，这表明商战与战争有根本的共同之处。

无论是战争还是商战，都是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只不过这种利益在军事上表现为攻城略地；在商战上表现为更多的利润或份额。

商战和战争都存在着对立的两极，如敌我，主客、众寡、强

弱、攻守、虚实。也就是说，参与竞争的角色必然是两极（或多极）；在力量对比上，存在着强弱大小之分；在竞争方式上有攻击和防御之别，如此等等。

因此，强势企业的剧烈竞争与战争决无二致，只不过看不见刀光剑影，弥漫硝烟。在竞争程度越来越剧烈的今天，企业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占领的市场时刻面临着瓜分威胁。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营销环境，并对变化的环境作出正确的反应，以较高的营销技巧和策略，取得市场竞争的主导地位，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由于竞争是力与力的较量，因而在一般的情势下，实力的多寡、强弱、虚实，与结局的胜负成正比。除此之外，对企业和国家来说，根据客观环境和自身的实力，采取不同的竞争策略，也可以获得一份意外的惊喜。

总的说来，竞争的形式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因而可以将竞争策略统分为两大类：即攻击策略和防御策略。

（一）攻击策略

攻击策略的运用者，一般是指实力居于较强优势，或者从破坏的均衡局面中获得了优势的企业或者政治集团，对居于劣势的一方直接攻击。当然也不排除匹敌的力量之间、弱者与强者之间实施攻击策略。

强对弱的攻击，以正面攻击策略为主。一九九四年，丹麦的嘉士柏啤酒率先直攻泰国市场，一年内获得 10% 的市场占有率；美国安海斯布希公司收购中国与德国合资的中德啤酒公司，在中国生产销售百威啤酒；统一六国过程中，秦国老将王翦发动的灭楚战争；就是采取正面攻击策略。

弱与强或强对强的攻击，有联合策略和侧翼进攻策略。

弱者与强者之争，或者力量均等的两股势力之争，要想取得

竞争的胜利，最佳的办法是联合第三者的力量，利用联合所形成的实力优势，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春秋晚期的晋阳之战，智伯鉴于实力上没有多少优势，就联络韩、魏进攻赵国，而后赵国又联络韩、魏反攻智伯，都是利用联合力量的优势；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设立“瓶装厂”，授权使用其商标和经销权，就是一种投资联合。

侧翼进攻策略，是指在竞争中不具备优势时，避实击虚，创造局部优势，从而获取竞争的胜利。齐魏对峙时期，孙臏发动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都是成功的侧翼进攻策略典范；70年代中期，日本和香港等地的厂家利用瑞士发明的石英技术制造了大量的物美价廉的石英表，将大批瑞士表挤出了国际市场，就是运用新技术带来的优势击败表坛霸主瑞士；美国三大车厂福特、瓦莱斯科，通用，利用日本一时经济萧条之机，大举反攻日本。这是侧翼进攻策略在行销领域的成功运用。

（二）防御策略

防御策略是固守于某一地点或市场以静制动形成优势，使竞争对手无懈可击。防御策略的最大特点为：这种防御并非消极地挨打，而是在防守中积蓄力量，等待形势逆转的契机，乘机反戈一击，将对手彻底击败。

战国时期，赵鞅领导的晋阳城防卫战；李牧领导的防御血奴之战；田单主持的即墨保卫战都是防御战的典范；瑞士海克财团，以新型手表“斯瓦奇”为最有力的武器，以抵御日本表对瑞士钟表市场的攻击，取得了非常惊人的成功，使瑞士表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回升到53%，这是防御策略在行销领域的成功运用。

实际上，竞争攻击策略，内容异常丰富，不可一一枚举。同时，在运用时又不可千篇一律，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势，灵活地加

以运用。正如《孙膑兵法》所指出的“胜不可一”。

《论语》有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日本近代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将这句话解释为：“富贵”是“人之所欲”，无可非议，关键在于取得“富贵”的目的与手段是否符合“道”，即是否合乎“公利公益”，合乎社会认可的工商道德。这里的“公利公益”，是企业竞争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而在这一点上，军事战争所受的约束力就小得多，“兵不厌诈”是军事家推崇的用兵之道，而“无商不奸”却一直是人们唾弃的行为。

最后，奉给诸君一句话，那就是“行事有方，结局自圆”。

编著者

1997年于太湖龙山宫